

中 外 名 人 傳

編輯委員會編撰
王治平主編

敬請指教，歡迎投稿。（稿約見六十六頁）

沈時可（一九〇八—一九九四）

田灌溉等水利工程參考。

沈時可生母陳叔貞早逝，幼隨父起居，庭訓綦嚴，在家之時，均須助理家事，習練書法。勤樸之風，刻苦精神，瀚墨造詣，皆自幼奠基。

沈時可是享譽國際的地政專家，臺灣土地改革的執行者，也是奠定臺灣經濟發展基礎的先驅功臣之一。

沈氏於清光緒三十四年，歲次戊申十一月十六日（一九〇八年十二月九日）誕生於江蘇省海門縣廟橋鎮。父親沈秉璗，字抱真，縣試及第，執教鄉里。旋入南通師範學校工科，再進河海工程專門學校深造，成績優異。兩校皆清末南通狀元張謇創辦，是以爲

任地政工作績效優異

院爲中央培育土地行政高級幹部而設置，具有大學研究院性質，學員生活作息採軍事化嚴格管理，學業規定更嚴，如學期考試成績有一科不及格者即予斥退。時可勤奮苦學，努力精進，得以第二名優異成績畢業。

建立臺省地政組織

民國三十五年六月，沈時可由行政院地政署推介來臺，初任行政長官公署土地委員會技正，短短數月努力草成臺省地政建制及公地整理計畫。同年九月奉令擔任臺灣省長官公署民政處地政局局長，掌理全省土地行政，各項計畫即付實施。

（七十）傳人名外中

（紫石）識拔，任淮陽徐海（蘇北）測量局長、導淮委員會委員兼測量處長、揚子江技術委員會委員等職，主持運河工程暨淮河入海工程，對蘇、皖水利工程貢獻卓著。民國三十八年來臺，曾將治理長江、淮水及運河

民國二十三年秋，沈氏奉派江蘇省吳縣（蘇州）籌設地政機構，到職僅數月即完成吳縣土地局之設置，出任首任局長，積極推展地籍整理等基本業務。年餘後奉調浙江省平湖地政實驗縣，擔任區長、科長，從事基層地政工作的策畫開展，頗多建樹。民國二

、體制，掌理全部土地行政業務。沈氏接長地

政局以前，各縣市尚仍在土地整理階段。經他積極推進，於民國三十五年底完成地政機關建制。各縣市政府一律設置地政科，下設地籍、地價、地權、地用四股，分別配置科長、股長及定額技術與行政人員，掌理所轄地政業務。又利用原屬地方法院之土地登記出張所，一律改組為地政事務所，並按各縣市實際需要，增加設置地政所，隸屬縣市政府，受地政科長之指揮監督，從事所轄各鄉鎮區之基層地政工作。此一層級地政機關，是臺灣省特有之設置，對處理人民土地權利義務相關工作極為重要。

臺灣自省至縣市乃至鄉鎮區，土地行政於茲建立統一完整的組織體系，多項地政基本工作，如地籍測量、土地總登記，以及公有耕地之留用、劃出和放租等，乃得以順利推展，奠定實施土地改革的基礎。

耕者有其田的前奏

安定。當時臺灣經濟係以農業為中心，農民占總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而佃戶約占總農戶百分之六八點八，故欲謀安定社會，改善民生，必須實施土地改革。（請參看陳誠著《台灣土地改革紀要》）二月，陳誠先宣布在臺灣省實施「三七五減租」（即佃租不得超過每年正產物千分之三百七十五），開始實行孫文民生主義之土地政策。沈氏以地政局長殫精竭慮負責主持執行。四月十四日，臺灣省政府根據沈時可所提方案，頒布「臺灣省私有耕地租用辦法」；十七日，省府成立「臺灣省推行三七五地租督導委員會」；

赴日考察土地改革

占總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而佃戶約占總農戶百分之六八點八，故欲謀安定社會，改善民生，必須實施土地改革。（請參看陳誠著《台灣土地改革紀要》）二月，陳誠先宣布在臺灣省實施「三七五減租」（即佃租不得超過每年正產物千分之三百七十五），開始實行孫文民生主義之土地政策。沈氏以地政局長殫精竭慮負責主持執行。四月十四日，臺灣省政府根據沈時可所提方案，頒布「臺灣省私有耕地租用辦法」；十七日，省府成立「臺灣省推行三七五地租督導委員會」；二十三日，省府宣布「三七五減租」自三十一年第一期農作物收割時實施；七月二日，全省各縣市「三七五減租」檢查開始；九月五日，臺灣光復四週年，在臺北市舉行「三七五減租」成果展覽，全省各地熱烈舉行慶祝大會。沈時可回憶錄說道：「一九四九年元月，陳誠就任臺灣省政府主席後……強力推行『三七五減租』政策，這項工作推行以後，地方出奇的安定，農村顯著的繁榮，以往因民間努力及人民平均所得偏低，兒童中求學者驟然增多，一時師資大為缺乏，不得已採代用教員制，國民就學率大大提高。……又因為農民生活改善，農村購買力增強，工商業頓形活躍，小型工業應運而生，農

（請參看中外雜誌第五十七卷第四期第四十頁沈時可著《台灣土地改革記》）

民國三十九年十二月，省府會議通過「整理地籍放領土地實施方案」、「扶植自耕農實施方案」。

民國四十年六月，省府頒布「臺灣省放領公有耕地扶植自耕農實施辦法」，走出實施耕者有其田的第一步。四十一年三月，地政局宣布，首期（四十年）放領公地逾二萬九千甲，承領農民達六萬一千七百餘戶。

赴日考察土地改革

沈時可為積極搜集資料起耕者有其田的立法草案，鑒於日本在盟軍統帥麥克阿塞頓促下於一九五二年完成土地改革，簽准層峰由沈氏及臺灣土地銀行前、現任總經理黃通、陳勉修組織三人小組赴日考察，為時三十五日。每到一處對土改優缺點儘量探詳記。統計有幾項顯著缺點：一是日本推行土改，用農民申請登記辦法，政府並無詳細資料記載可資校正。因此，同一土地其申請者常達七、八人之多，而且比比皆是，群起爭執，農民和政府遭遇無限困擾；二是日本政策、價值、位置等，常有不公平欠合理的缺失；三是日本政府徵收地主土地概以現金補償。而戰敗後經濟凋敝，通貨膨脹激烈，現

金迅速貶值，地主生活無法維持；四是都是都市耕地徵收放領，農民轉手之間迅獲暴利，而原地主反而一無收益。

沈氏等返國後針對日本缺失，簽報上級做了幾項重要決定：(1)地主保留地一律按住所遠近作保留先後的依據，並一律以等則為依歸，以求公平；(2)對徵收地價一律按實物補償，以保障地主地價收益保值；(3)位在都計畫範圍內的出租農地一律不予徵收，以免造成重大問題。

地籍總歸戶奠基礎

沈氏借鑑日本實施土地改革的缺失，連同臺灣實施公地放領所獲經驗，邀集副局長何夢雷（沈氏政大地政學院同班同學，一直竭智盡慮襄助局長，沈氏退休即由夢雷接任。）等基本幹部多人，組成委員會推展工作。先辦全省性地主所有土地總歸戶，將每鄉地主的土地，依照姓氏、地址分別歸戶。所謂歸戶，卡片分為兩種：一以戶籍為主，稱歸戶卡；一以土地為主，稱地籍卡。仿效大陸魚鱗冊戶領地及地主戶。一律以戶為主，將其全省所有各鄉土地，照政府存有的三七五減租租約，將地主的地目大字、小字及等則數額，分別記載在同一校正卡上，同時又將地主姓名、住址門號相同者集中，鄉鎮者集中到縣，再將縣與縣間集中到省。各縣將戶卡集中抄錄在同一卡上，然後存放於地主居住所在地的地政事務所，以免遺漏，務求

翔實。這項工作共動員一萬二千人，費時六個月，於民國四十一年四月完成。

訂立法案吃盡苦頭

沈氏擬訂耕者有其田法案，真是飽經挫折，吃盡苦頭。民國四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提出「臺灣省扶植自耕農條例」草案，送達省府，先遭民政廳長楊肇嘉擋置，沈氏往返十一次，始簽章轉呈吳國楨主席。提報省政府會議，於六月二日召集審查會，不兼廳處長的委員均有意見，經過七次審查會，始由主席裁定於七月十八日送臨時省議會，且為爭取時間，於八月九日併報行政院核示。

草案送達議會，外間流言甚多，沈氏每天等候議會詢問，準備嘗此苦味。議員五十餘人先後強烈質詢，甚至有高聲謾罵者，雖經沈氏以和善態度委婉作答，均稱不滿意。有位郭秋煌議員說：「你沈時可在臺無尺寸之地，慷他人之慨，毫無人心，只討上峰的好，你對得起臺灣地主麼？」沈氏聞言很沉痛的答說：「我沈時可雖在臺無尺寸之地，可是在江蘇省海門縣是生長大地主家庭，目睹先母尺寸節省得有許多土地，連海邊開發土地，著實要較臺灣大地主大得多。平時先母對佃戶欠租特予免除者甚多，到頭來佃農受其黨的煽惑引起鬥爭。時先母已去世多年，竟將其墳墓掘去，揚骨灰粉，家中房屋全被拆毀，家兄聞訊本已逃避上海龍華鄉間，

立院風暴堅持原則

為明示土地改革之目標，行政院乃將「臺灣省扶植自耕農條例」草案修正為「實施行政院政務會議有兩點重要爭辯：(1)是地主保留由二甲改為三甲，以致實際可徵收的地面積由十九萬甲降到十四萬多甲，變成了百分之六十一。(2)是地籍冊上的戶名以四十一年四月一日為準，以防止地主分散過戶，逃避徵收。

民國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耕者有其田法案由行政院送到立法院，凡院會或小組審查，省主席俞鴻鈞、內政部長黃季陸，對委員質詢均指定沈氏答覆。沈氏乃遭遇立委窮追猛打的政治風暴。如有苗啟平委員譏罵沈時可如此頑固卡死地主，有三個死罪實不可赦；廖維藩委員連敲手杖大聲說，沈氏罪狀雜亂無章等等，東一問西一問不著邊際的問，一連質詢前後十七天，沈氏耐心答復詳盡而透澈，毫不含糊，並堅持法律條文應

台灣是先受了血的教訓，希望臺灣不再受此等非人的痛苦。」（請參看中外雜誌第五十七卷第四期第五十二頁至五十三頁沈時可著「台灣土地改革記」）沈氏答話聲淚俱下。此項質詢共歷時二十七天，始分條審查稍作修正，再經兩星期之質疑，經解答再作修正後，於八月三十日呈報行政院參考。

耕者有其田法案在立院的激烈爭議，爲蔣中正總統得知，以國民黨總裁身分，邀集立法院委員會重要召集委員及有影響力的委員、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秘書長張其昀、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主任委員蔣夢麟等開會決議：定明年（民國四十二年）一月份起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

民國四十二年一月中旬，立法院將「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草案由四委員會聯席會議審查完畢，交全院大會三讀通過，咨請總統於一月二十日明令公布。二月二十日，地政局訂定耕地徵收、保留、放領等處理程序。五月一日，省府公布：實施「耕者有其田」徵收與放領，爲期三十日。

謹慎執行農地改革

沈氏主持執行一歷史性重大政策，前無先例，萬一錯失使國家政策不得實現，不僅抱憾終身，且或將判處重刑。因乃竭盡所能謹慎處理。先經全省總複查，分鄉按戶由鄉長與土地之四鄰到場實地確認其真實簽章存證。總複查之後再經地主、佃農、自耕農代表所組織之租佃委員會逐筆、逐冊按戶審查，分鄉、分里、分鄰核對清楚。然後分鄉公告一個月，准由地主、佃農提出更正。一面按戶向佃農說明，尊重其自由意志提出承領申請，申請書須蓋指紋印以防假冒。此項工作共動員三萬二千人，乃調集有關機關職員、國小教師及智識青年施以短期訓練，在地

政中心幹部指導下，分里分鄰計共七千單位，大里四人管二百餘戶，小里管一百餘戶，事先分有各里地籍圖、佃農地主名冊及詳細住址、推行手冊等簿冊用具。工作時每夜將結果及遭遇困難報告鄉負責人，有不能解決問題立即反應至縣，更重要的問題反應到省地政局，有副局長何夢雷等高級幹部九人立即研定解決辦法，並先通知其他各縣如有類似事件即照地政局的解決方法處理，以預防因延緩處理而使事態複雜漫延，危害無窮，

同時電話發生問題場所。沈氏此一作法，乃基於其多年地方行政經驗，確保此一要政之順利貫徹實施。

推行三七五減租時租約一式三分，佃農、地主、政府各一。在公告後佃農皆以申請承領書換取所有權狀，又以繳納田賦通知書繳納第一期田賦，完成放領手續。一面在公告完成後，即通知地主繳回被徵收土地所有權狀，以換取補償地價之土地實物債券，及水泥、工礦、農林、紙業四大公司股票。如地主遲不繳納，則於逾期十日後，由政府依法登報申明他們應換取的實物債券及四大公司股票，依法提存法院，提存費由地主負擔。

土地重劃促進利用

臺灣自農地及市地改革相繼實施成功，省地政局爲促進土地利用，綜合性改良以地盡其利，分別辦理農地、市地重劃。在農地

重劃，先經試辦、示範成功，訂定自民國五十一年至六十年重劃三十萬公頃之十年計畫，總計完成面積二十五萬五千餘公頃。因沈氏的積極主辦，他退休後繼續任者接續辦理，至八十年已完成三十六萬七千餘公頃，占台

灣農地總面積百分之四十一。至市地重劃乃於民國四十七年及四十九年由高雄市選定兩地區試辦，成效良好，地政局遂自五十一年起全面推動辦理，至八十年總計完成面積八

推行都市平均地權

民國四十三年八月，政府公布制定「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地政局特舉辦擴大講習會，歷時七日，與會地政、財稅、土地銀行等職員數百人。陳誠副總統親臨致詞，對沈氏頗多嘉勉。四十五年一月，臺灣省訂定都市平均地權工作程序。主要之「規定地價」，係經政府查估評議公告後，由人民自行申報決定。據以執行照價徵稅、漲價歸公、照價收買等改革措施。是以地價查估與申報兩者是市地改革最重要、最繁難的關鍵性工作。沈氏更是辛勞奔波，督察督導。因地價查估工作確實公平，人民申報地價土地比率達百分之九十七以上。

外 績效至鉅。

訓練國際地政人才

臺灣完成土地改革之恢宏績效，不僅對國內政經發展產生巨大影響，亦廣受國際重視。先後有多國之元首、國會議長、民意代表、學者專家來臺參觀考察者計四十餘國。

民國五十五年七月，世界土地改革會議在羅馬召開，沈氏代表臺省與會，提出「土地稅與臺灣土地改革之關係」論文報告，廣獲與會者之讚佩。尤其美國哈德福大學校長兼林肯土地政策學會副會長伍德福博士，邀請沈氏參加次年該會年會，並於五十六年十二月在我國召開世界國際土地改革會議。與會人員經實地考察研究我土地改革之成就，咸認可作為開發中國家發展農村之借鏡，建議在臺設立土地改革訓練所，訓練各國地政人才。

該所於五十八年設立於桃園，沈氏兼任執行秘書負責所務。每年接受各國保送人員受訓，教育方法採講演、研討、實地考察等方式，聘請國內外專家任教，並有臺灣土地改革暨各學員本國有關地政資料提供研究，裨益學員返國後實務推行，參訓國家已有八十國，受訓學員五千餘人，使孫文民生主義土地政策宏揚於世界！

盡瘁地政勳猷永昭

沈時可自民國三十五年就任地政局長，

至六十一年退休，長達二十七年。當時的臺灣省尚包括現在的臺北、高雄二院轄市。而省地政局僅是隸屬民政廳的三級單位，機關層級與官位均不高，竟能順利執行完成土地改革等歷史性重大功業，勳猷卓著。蔣中正總統分別於四十九年頒給光華甲種二等獎章、五十二年頒給四等景星勳章、五十六年頒給三等景星勳章。尤其五十二年五月，耕者有其田實施屆滿十週年，在臺北市省立博物館舉行成果展覽，蔣中正總統偕宋美齡夫人，由黃杰主席陪同參觀，當面嘉勉沈氏：

你們對國家是有功的！」使他倍感光榮！

沈氏主持土地改革訓練所，再於民國六十九年退休，畢生盡瘁地政三十餘年。奉行國策，忠勤任事，操守謹嚴，生活儉樸，不煙、不酒、不賭，即應酬飲宴亦極端避免。對所負責任具有堅毅使命感和擔當，不辭艱苦，不計毀譽，經常日間奔波，漏夜治公，

領導同仁，克服挫阻，貫徹執行。最難能的數十年中，包括輿論及民代，從未有人對他提出質疑！退休以後，兩袖清風，與黃樹曉夫人共渡清苦恬淡的生活。樹曉系出海門望族，上海女子大學肄業，任職臺灣土地銀行二十六年退休，沈氏工書法，黃曉長繪事，育有長子昌言，陸軍官校畢業，服務交通事業；次子公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工程博士，現職美國休斯公司總理；三子介言，中山醫學院畢業，執業牙醫；女雅言畢業師範大學物理系，任教復興高中。

沈氏於民國八十三年五月十七日病逝，享年八十七歲。李登輝總統頒「勳猷永昭」勳額，並明令：「綜其生平，寢饋地政數十年，勳猷並懋，績效孔昭，至足矜式！」予以褒揚。（張力耕撰）

朱際鑑（一九一四—一九九二）

老父剿賊被賊殺害

史學家，前國立師範大學教授朱際鑑，

畢生沉潛史學，著作等身，在他著作中對史實的銓釋，別具見解，課堂講述，也能發人之未發，言人所未言，使受業學生獲益非淺，因而深受愛戴。尤其是他以教育為職志，淡泊名利，簞食瓢飲，惟以讀書為最樂，志行之高潔，也為門生故舊所崇拜。

朱際鑑字劍一，湖南石門人，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生於石門縣，朱家在石門是一個大家族，族人廣佈鄰近三縣，民國初年，石門縣因地處僻壤，治安不良，盜賊蠭起，荼毒百姓，朱際鑑的父親朱咸正睹狀深憂慮，乃登高一呼，組織保安團實施村落聯防，使盜賊大受抑制，此舉遭盜匪嫉恨，屢思報復，竟於一九二二年被賊殺害，家宅也被放火燒毀。當時朱際鑑才九歲稚齡，朱母恐兒子遭劫，乃把他寄養到親戚家，延師為他啟蒙，研讀國學舊籍，知識大進，奠定深厚

身履險地撫輯流亡

(七十) 傳人名外中

一九二九年，十六歲的朱際鑑升學石門縣立初中，修習近代知識。次年，復隨其師蘇建秋轉學到杭州中學，該地山清水秀，學風淳厚，正擬假此良機，用功讀書，不料突患重病，被迫輟學養病，客中生病，誠為人生之一大不幸，多蒙師友勤於照拂，病體痊癒，但杭州中學的學籍已失，不得已乃北上，考入北平市立第三中學就讀，苦讀兩年，而於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升入河北省立北平高級中學，修業期滿，畢業時適逢七七蘆溝橋事變，全面抗戰展開，華北動盪，許多地區淪入敵手。湖南人朱際鑑乃匆匆南返，後來在西安考進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歷史系，不久，北師大、北平大學和北洋工學院合組成西安臨時大學，因戰局逆轉，學校由西安再遷城固，改稱西北聯合大學，朱際鑑隨校播遷，一面讀書，一面以學生身分參加抗日行列，救亡圖存，奔走陝南各地，宣傳抗日，激勵愛國情操。一九四一年朱氏由西北聯大畢業，決定全心投入抗戰，由學校派往西安工作，擔任中央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政治教官，講授文史課程，很受學生歡迎。

於烽火遍野之地，講台授課太過安逸，朱際鑑不以為然，自動請派艱險的工作，乃由訓練團派赴界首，負責招集淪陷區的青年送往後方受訓，充實抗日戰力。界首在皖、

豫、蘇三省交界處，為接敵的前線，日寇鐵蹄會隨時出現，所以許多人視為畏途，裹足不前，朱際鑑挺身前往，出任蘇魯豫皖邊區抗敵總部文教委員會主任一職，在職期間出生入死，招撫淪陷區的青年，一批批的送往後方，其中有若干人後來又輾轉來台，功成業就後，對朱際鑑感念不已。

執教師大學者愛戴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日寇投降，朱際鑑仍留在安徽，攜眷赴皖北的蚌埠，任職安徽三民主義青年團潁縣分團部，直到第二年春天，他的老師李季谷邀他到上海，遂即隨同來台，接收日據時期的臺北州立高等學堂

，接收後改名為台北中學，他被派掌教務，後來台北高中改制為師範學院，朱際鑑擔任講師兼秘書，後來又兼註冊組組長。師院改制為大學後，由於朱際鑑勤於治學，精於研究，先後完成著作「九州考」、「北魏均田制的研究」、「中華民族發展史略」、「渡河流時代與渡氣流時代」、「歷史教育之理論與實質的分析」、「由鈴木大拙答胡適博士文中有關禪非史家所可作客觀的和歷史性的考察之辨釋——兼述歷史與禪之關係」、「史」、「魏晉南北朝史」、「史學教材教法」等書，均已付印出版，另外還編有講義、手稿，多達數大箱，均待整理付印。由這些著作可見他讀書之勤，用功之深。因而他雖無足以嚇人的博士學位，卻能由講師副教授升至教授，指導過多位碩士、博士研究生，引導他們進入學術殿堂。

朱際鑑執教四十餘年，先後講授的課程有「中國通史」、「魏晉南北朝史」、「中國文化史」、「秦漢史」、「歷史教學實習」等，他授課重啟發，不重記憶，主張由歷史中自覺，不要學生死背史實。他所寫的「渡河流時代與渡氣流時代」一文，曾刊佈於香港「自由人報」，受到該社社長政論家雷嘯岑的激賞，兩人結為好友，時相往還。

白色恐怖一度受累

執教期間，朱際鑑由國民黨部推薦，曾進入革命實踐院第十四期受訓，但他無意仕途，始終堅守教書崗位。主因是他在戒嚴時期，始終堅守教書崗位。主因是他在戒嚴時期，因為廣受學生愛戴，求教學生甚多，一度受到牽連，小有災難，但他毫無怨尤，深知國家處境艱危，為了生存發展，不得不作萬全之計。而他卻因此對於入仕變得毫無興趣了。

平日，朱際鑑從不以「政治受難者」自居，相反的，他仍忠心耿耿的效忠他的黨，他的國家及他的文化傳承。他們關心的不是他一己的出處和個人權益，而是民族的大是大非和文化出路，而付諸實踐的起點是關懷他的學生、朋友以及他所認識的人。他畢生

中住在初來台時的舊宿舍中，破落不堪，四周雜大廈連雲，朋輩都以為太過簡陋，勸他搬遷，但他淡然處之，安居若素，可見他的胸懷磊落，崇尚樸素，保有中國讀書人的風範和志節。

學究天人亦儒亦俠

朱際鑑在思想上，繼承中國古代的宇宙觀和世界觀，融和儒、釋、道三家於一爐，秉承民族主義以撻伐任何形式的帝國主義。他是亦儒亦俠、出入學術和政治之間的清末倭仁兼譚嗣同之流的人物，而與五四運動以來主流思想界處於對立面。

朱氏的史學成就不僅僅在作品上，還要看他講課，他許多寶貴的學術創見不曾公諸於世，而是宣之於課堂。只有他的學生才知道他是中國當代歷史學界的魯靈光殿。從大史學家司馬遷、陳壽、司馬光以降，以迄黃宗羲和章學誠，朱氏可說是這個史學傳承的殿軍人物。這一脈相承的學統至朱氏而成廣陵絕響。中國近世以降少有人物，再加上國運不濟，不但洋人蔑視中國，矮化中國文化；連中國人自己也因內部族群矛盾而不認同自己的文化傳承。中國人數典忘祖之餘，竟到懷疑自己文化價值的悲境。就在這個中國文化式微、洋人憑凌之際，朱氏毅然肩挑光大中國文化的時代使命，他的講堂就是他戮力發皇國魂的戰場。

(七十) 傳人名外中

留美史學家林毓生多年前聽人講朱際鑑

的事蹟後，不禁嘆道：「不愧豪傑之士！」

葛顯禮（Kopsch Henry Charles Joseph），英國人。清同治元年（一八六二）

如今這位豪傑已歸道山，世界上少掉的不是一位豪傑，而是少掉一位述而不作的史壇巨擘，崇尚樸素，保有中國讀書人的風範和志節。

陽曆元月，經海關總稅務司李泰國之引介，在海關任職。初於一八六三年為基層之稅務員，至一八六七年十月即升充副稅務司。翌

，少掉一位堅定對中國文化認同的傳道家，氣沖斗牛的俠士。朱際鑑是歷劫紅塵、百折不撓的人間鬥士，他是集聖人、傳道家、神仙、俠士、鬥士等人格於一身的大史學家。

他的史學風格有賴他的門生發揚光大。朱際鑑和夫人邱琳明結褵四十餘年，邱女士幼習師範，抗戰時流亡後方，由立煌往西安，考入戰幹團習會計，一九四五年兩人附中研究部及師大訓導處，善盡職守，四十

年如一日。朱際鑑逝世後，邱女士曾賦感懷詩：「情結漸水畔，愛生秦樓邊。妙姻自然成，不假媒妁言。不本父母命，月老巧引線。」歷亂偕白首，堪稱三石緣。」可見他們鵠鷺情深。

朱際鑑幼妹際惠隨他來台，由他主持婚嫁。他自己育有三男一女，純武、純甫、純一、純思，皆學有專長，貢獻社會，堪以告慰了。（王培堯撰）

實以葛顯禮為第一人。

按葛顯禮在中國海關任職達三十八載，先後曾在鎮江、台南（安平）、上海、牛莊、九江、北海、寧波及淡水（滬尾）等海關為稅務司。自一八九一年四月一日起接充海關總署派駐上海之造冊處稅務司，於一八九六年兼任郵政總辦後，未久，即於一九〇〇年辭職返英國養老。

大清郵政官局首任郵政總辦

葛顯禮（一八三〇—一九〇〇）

中 浙江寧波海關爲稅務司任內，應寧紹台道薛福成之囑，提供研議「申復郵政辦法」凡一十五條。薛據以奏請上峯准予試行，是乃日後總理衙門奏請創辦國家郵政之張本。《交通史郵政編》內載：

「（光緒）十一年，候選州同李圭條陳於浙江寧紹台道薛福成，請試行郵政，並照香港英國信館所刊通行條規，譯擬《郵政局寄信條規》一百五十三條，一併呈遞。福成據以商之寧海關稅務司葛顯禮詳細申復。」

按以上史事，實即指葛氏參與研提之興郵方案，其所述之首條云：「中國就通商各口岸先行創設郵政局，是爲最要之事，揆度情勢，不宜再緩，因其事若再任令外國辦理，實失大國體面。」具見關切之情。

葛顯禮在華供職垂四十載。清廷嘗授以文官三品之榮銜，並頒賞一等三級雙龍勳章。英國政府亦賜之以騎士勳位（Chevalier of the Order of Francis Joseph）。（晏星撰）

佐藤榮作（一九〇一—一九七五）

日本前首相佐藤榮作是戰後帶領日本逐步走上富強之路的重要政治人物之一，任首相職位長達七年八個月，對日本政經發展有深遠的影響。

佐藤和他兄長岸信介先後出任首相，打

破日本的歷史紀錄，兩兄弟都是戰後復興日本的功臣吉田茂得意的政治門生，但佐藤久居政壇要津，影響力尤在乃兄岸信介之上。佐藤在位時期最大的政績就是把琉球收歸日本，併入版圖。這塊長期原屬中國的領地，從此確定其身分地位，今後如再想改變，恐怕難如登天，佐藤爲收回琉球，在台灣、中共及美國之間，使盡政治權謀。用心之深，手段之精，迄今仍令人嘆爲觀止。

佐藤是日本群馬縣人，和他的哥哥一樣出身政治人物搖籃的東京帝國大學，早期受知於戰後首任首相吉田茂，曾擔任科學技術廳長官、通產相、厚生相等要職，一九六四年繼池田勇人出任首相。作爲吉田茂的傳人，佐藤榮作無論在思想邏輯和政策作爲上，都和吉田如出一轍。他們的基本調子是「日本第一」。既然「日本第一」，其他對外政策都是這個基調的附屬品，替這個基調服務。

葛顯禮在華供職垂四十載。清廷嘗授以文官三品之榮銜，並頒賞一等三級雙龍勳章。英國政府亦賜之以騎士勳位（Chevalier of the Order of Francis Joseph）。（晏星撰）

戰後日本的對外政策，以美國馬首是瞻

，爲了討好美國，日本對中國的政策，表面上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擺出友好姿態，骨子裡卻是「兩個中國」政策。吉田茂是反共的，然而國民政府於一九四九年撤離大陸，使吉田茂對中共存有幻想。因而於一九五二年四月，當吉田以首相兼外長的身份和中華民國交涉簽訂和約時，他最初只承認復交，而拒絕和約，更拒絕根據一九五一年舊金山對日和約的精神簽訂中日和約，吉田以中

華民國政府撤出大陸爲由，不承認中華民國，享有對日作戰同盟國的同等權利，也不承認應享服役賠償權利，甚而把和約適用範圍拘限台灣、澎湖。經中華民國代表力爭，以及駐日盟軍總部的壓力，才在換文中改爲：本條約各款，「關於中華民國之方，應適用於現在中華民國政府控制下或將來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領土上。」事後吉田毫不諱言的公開表示，希望和中共簽訂另一部全面和約。

吉田的這個想法，一直是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榮作乃至田中角榮等內閣對華政策的基調，所以後來田中承認中共，與中華民國斷交，是早已埋下的必然結果。由於這一因素，於一九六一年七月，佐藤在池田內閣擔任通產相時，即和中共代表南漢宸有了來往。一九六四年春天，當中共商展在東京舉行的時候，佐藤公然以科學技術廳長官的身份到場捧場，並喊出口號：「日本（中共）兩國交流，是誰也擋不住的。」

而佐藤當時的長官首相池田勇人是著名的媚共人物，一向直接勾搭中共。只因美國人不喜歡，不敢在政策上急轉彎。佐藤在執政的自民黨內一直和池田唱反調，被目爲左派反共親華（中華民國）的人物，其實佐藤和吉田茂一樣，心目中只有日本的第一，「友邦」只是「日本利益」下的一個籌碼而已。而被中華民國視爲友人的佐藤榮作早已心有旁騖，就是欲結交中共。由於佐藤以閩員

中身分大捧中共，於是中共在一九六四年秋天外，接納了佐藤的代表人物衆議員久野忠治，周恩來面告久野，欲在是年十月在東南亞某地秘晤佐藤榮作。但因池田勇人急病辭職，佐藤登上首相寶座，此事只好作罷。

佐藤上台後的一大心願，就是收回琉球

，他知道要收回琉球，有兩大件要事要做：第一是搞好美日關係，好讓美國人快速而不遲疑的交出琉球，第二是搞好韓國和中華民國的關係。尤其是後者一直對琉球有宗主權，如得不到中華民國的諒解，是收不回琉球的。所以他積極的在這些重點上下功夫，

一九六五年一月，佐藤訪美，簽訂日韓基本條約，表達了支持韓國反共鬥爭的決心。八月親自往訪在美國管制下的琉球，在琉球他高呼：「收不回琉球，日本便不算是戰後！」意思是琉球到了手，日本在精神上才算完全結束了戰爭。

儘管如此，佐藤仍未忘情於中共，他派

副總裁川島正次郎赴雅加達秘晤周恩來，允諾改善關係。一九六七年九月，佐藤專程訪問了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在台北機場他毫不掩飾的告訴記者，他是為請求中華民國支持日本收回琉球而來。佐藤此行雖未獲得中華民國的公開承諾，起碼已獲默認，否則琉球不會如此輕易的任由美國移交日本。

一九六八年四月，美國把小笠原群島還給日本，為琉球交給日本邁前一大步。

一九六九年佐藤三度訪美，和美國總統

尼克森發表聯合聲明，承認台灣和韓國地區的安全和日本的安全息息相關，聲明中並指出美國將於一九七二年把琉球交給日本。佐藤的這一聲明，旨在安撫中華民國，即琉球在日本手中，對台灣安全更多一份保障，台灣更可放心。

儘管佐藤惺惺作態，但在琉球未正式移交前，他正迫不及待的派人和中共進行大使級的談判，我駐日大使彭孟緝多次提出抗議，交涉均無效果，原因是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這一年發展動搖，雖尚未被排除，但已風雨飄搖。不久被排出聯合國，對日本收回琉球已構成威脅。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佐藤政府和美國正式簽訂收回琉球條約，表達了支持韓國反共鬥爭的決心。八月親自往訪在美國管制下的琉球，在琉球他高呼：「收不回琉球，日本便不算是戰後！」意思是琉球到了手，日本在精神上才算完全結束了戰爭。

儘管如此，佐藤仍未忘情於中共，他派副總裁川島正次郎赴雅加達秘晤周恩來，允諾改善關係。一九六七年九月，佐藤專程訪問了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在台北機場他毫不掩飾的告訴記者，他是為請求中華民國支持日本收回琉球而來。佐藤此行雖未獲得中華民國的公開承諾，起碼已獲默認，否則琉球不會如此輕易的任由美國移交日本。

一九六八年四月，美國把小笠原群島還給日本，為琉球交給日本邁前一大步。

一九六九年佐藤三度訪美，和美國總統

，拒見日本特使，此事遂胎死腹中。

是年十一月，聯合國大勢逆轉，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佐藤即囑自民黨幹事長保利茂透過親共的東京都知事美濃部亮吉給周恩來一信，信中表達三點：（一）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的合法政府；（二）承認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三）為了恢復中日邦交願派保利茂到北京商談。周恩來因信中未表明中共為代表中國之唯一合法政府，有兩個中國的陰謀，拒絕接受這封信，保利茂碰了一鼻子灰。

到了同年十二月，由於佐藤一再派人洽談，日本已完成接納了中共的要求。佐藤指示部屬擬好有關和約、文化協定、通商協定、漁業協定、航空協定等草案，準備帶到北京和中共簽署。一九七二年一月，佐藤把這個計畫告知黨內要角田中角榮，福田赳夫和中曾根康弘。希望先尼克森一步到達北京活動。不料未及實現，佐藤即在黨內的壓力下不得不宣佈下台，由田中角榮繼任。所以佐藤榮作。

佐藤聽說尼克森將訪問中國大陸，時間是一九七二年二月。他立刻心頭浮上一個念頭，要在尼克森之前先到大陸走走，於是派出了親信衆議員小奎義昭，外交顧問江國真彥、秘書西垣昭等人攜帶他給周恩來的親筆信，赴香港向中共駐港機構投石問路，信中表明

希望「中（共）日關係正常化」，他本人願意到北京晤談。由於當時日本支持聯合國決議：「中國代表問題屬重要問題，需會員國三分之二的決議才能變更。」周恩來腦羞成怒

，拒見日本特使，此事遂胎死腹中。

中遠不如中華民國給他的利益大。（王善初撰）

福田赳天（一九〇五—一九九五）

日本前首相、元老政治家福田赳天，在日本及台灣，均被認為是親中華民國及堅決反共的政治人物，其實說他反共殆無異議，至於親中華民國一語，必須稍作保留，他真正親近的還是日本和大和民族，只是基於反共，對中華民國較為親善而已。由於他對我友善，故而與我國朝野人物多有交往，戰後與我國要人何應欽、張群，乃至先總統蔣中正都有相當交情。

福田赳天是戰後日本政壇上的青年才俊，受知於岸信介及佐藤榮作兩位兄弟檔首相的提攜，官位扶搖直上，但在佐藤兄弟作古後，福田遭黨內排擠，在田中角榮及太平正芳之後才當上首相，算是大器晚成。

福田赳天於一九〇五年一月十四日生於東京西北郊群馬縣的榛名山山麓，少年時代家境不佳，每天要步行五哩到高崎上中學，一九二九年自著名的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後，即進入大藏省工作。自學生時代開始，他就精於圍棋棋道，懂得如何運用形勢圍攻敵人，擅長運用凌厲的攻勢，針對敵人弱點攻擊，這一精神，他一直運用在工作上，到死方休。

（七十）傳人名外中

日本群馬縣以婦女專制著名，但福田所

娶的妻子，卻是位賢妻良母，節儉樸實，刻苦勤勞，把全部精神用在持家及教育子女身上，使福田無後顧之憂，全力在政壇衝刺。

進入大藏省工作後，由於福田赳天學識良好，秉性溫和，應對有節，甚獲主管欣賞，一直受到拔擢，一九三〇年代，他被派往倫敦和巴黎，處理日本國際經濟事務。一九四一年，日寇侵華，佔領了大半部中國領土，福田被派往南京，擔任日本扶植的汪偽政府的財政顧問，直到一九四三年，調往大藏省。到了一九五〇年，日本戰敗初期，他已升為大藏省的預算主任，算是日本政府的財政專家了。

福田的公職生涯遭到一次挫折，即在戰後不久發生一件官場醜聞，涉及許多高級官員，福田赳天被控收受賄賂，遂即於一九五〇年辭去公職，纏訟兩年，法庭終於還他清白，於一九五二年無罪開釋。檢方不服，提出上訴，直到一九五八年才完全洗脫罪嫌。這次吃官司對他來說是危機，也是轉機。在訴訟期間，他沉潛自省，卒告調整自己，擺脫做官時無意間養成的僚氣和驕氣，開始和氣待人，謙恭有禮。一九五二年國會改選，他參與角逐，順利當選衆議員，進入國會。

到了一九五九年，他轉任農林大臣時，已是資深代議士了。次年，他被執政的自由民主黨選為政策研究小組主席，開始進入權力圈

長，兩年後復任大藏大臣。一九六九年，佐藤改組，他連任大藏大臣，又幹了七個月，佐藤首相要他出任外務大臣，負責執行佐藤的對外政策。

擔任外相的福田赳天，把日本以自我為中心，處處以輸出貨物為重點的國家，變成一個在國際事務上舉足輕重的國家，福田曾透過新聞媒體，向日本人表示：「我們是個島國，也有島國的精神和民族性。過去，我們每個人都以本國為先，但今後我們將加以修正，把目光擴展至整個世界。」於是他也以開放的態度，參與各類國際會議，包括對美的貿易談判，諸如紡織品、汽車等問題，必要時，作若干讓步，讓美國人了解他解決問題的誠意。

在佐藤政府晚期，一般人均相信福田是佐藤刻意拔擢的繼承人，而他的接任首相，也是順理成章之事，不料一九七二年佐藤因病被迫辭職時，卻發生「角福之戰」，即田中角榮和福田赳天均宣佈角逐首相職位，當時在自民黨內，各派閥合縱連橫，經過月餘逐鹿，由田中角榮掌握了多數優勢，使這位政壇才子，竟敗給稍通文墨的田中角榮之手，只好黯然退下，隱居幕後。後來田中擔任首相期滿，又把政權交給同派的太平正芳，直到太平正芳去職，政治生態改變，福田才在派閥妥協的情況下，當了一任太平首相，這時，福田已年逾古稀，不復當年的銳氣了。

福田於卸任首相後，即隱居東京，怡養天年，一九九一年曾來台訪問，與李登輝總統相談甚歡，福田亦以中華民國永久的友人自居，退職後，運用其影響力，推動「日華懇談會」的工作，協助中華民國繼續發展。到了一九九五年七月，卒告老成凋謝，病逝東京，享年高達九十歲，算是福祿壽俱全了。（劉先軍撰）

瞿韶華（一九一四—一九九五）

政壇甘草長於協調

總統府國策顧問瞿韶華於一九九五年五月病逝台北，享年八十三歲。

瞿韶華在台北政壇屬甘草性人物，長於折衝協調，故而久居幕僚職務，有「最佳幕僚長」之譽。他曾經擔任行政院副秘書長一職長達十五年，又擔任台灣省政府秘書長六年，行政院秘書長六年，幾乎大半生都在「爲人做嫁」。後來雖獨當一面，出任部長，卻是冷衙門的考選部長，而且已是「古來稀」的年紀。不過他的老運不錯，七十七歲調任國史館館長，做了國史修纂的主持人，這個職位雖非燦爛耀眼，但卻可青史留名，今後凡是留心中華民國的人物，都會知道瞿韶華這個人。

瞿韶華字福元，河北定興縣人，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甲寅）農曆十月八日生於

故里，家世毫不起眼，祖上在清代沒有功名。其父瞿國鈞在故鄉只是個沉溺泥色夢中的農夫，讀過幾天線裝書，識得一些字，在鄉里也算個人物了。瞿國鈞育有四子，瞿韶華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因而瞿韶華自幼即由其父送進學堂讀書，在他的幼年時代，正值新舊交替，不過新制小學、中學已經普遍設立，瞿韶華由啟蒙開始，即受現代新式教育，只讀過短暫的私塾，念了些四書五經。不過那時的新制學堂，對國學仍十分重視，所以瞿韶華仍奠下相當不錯的舊學基礎。

大學時代秘密抗日

瞿韶華天資聰穎，又肯用功，小學、中學時代，學業成績經常名列前茅。中學畢業後考進北平著名的朝陽大學法律系攻讀法學，朝陽法律系名震中外，在當時有「北朝陽、南東吳」之稱，是北方的法學重鎮。瞿韶華能考進這所著名的大學法律系，可見他的根基不錯。然而他的大學生活並非平靜無波，可像現在的大學生一樣「任你玩四年」，

朝大以教學嚴謹著稱，瞿韶華必須勤奮苦讀，才能通過考試的嚴格檢驗。同時，東鄰日本正謀侵華，華北已逐漸淪入其惡勢力掌握之中，青年瞿韶華見強姦欺侮，國勢阽危，愛國之情油然而生，學生時代即慨然加入主導國民革命的中國國民黨，立志報國。所幸局勢雖危，卻未中斷他的學業，順利畢業，

取得法學士學位，旋即進入國民黨北平市黨部工作，初任幹事，不久升爲科長，領導同志在北平發展組織，壯大抗敵禦侮力量。

周旋敵後出生入死

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後，展開全面抗戰，北平已在敵偽勢力範圍內，瞿韶華和他同志奉令轉入地下工作，他秘密組訓青年，活躍在平津地區。一九三〇年他被調往北平三民主義青年團支部工作，但仍兼任黨職，一九三二年，中央爲培植他的工作技術，調他到重慶中央訓練團受訓，由北平到重慶，關山萬里，要越過淪陷區、前線，才能到達。接到命令後，他不避艱險，跋山涉水，晝伏夜行，躲過敵偽巡邏哨，和前線的火網冷槍，才到達重慶，不料甫告抵達，即獲悉在敵後的我方機關已被敵人偵破，許多同志被捕。他沒有報到受訓，即啣命趕返平津，重整三民主義青年平津分團部的工作，重布情報網。他在北平日寇特務機關附近，冒險佯設日本料理店及法律事務所，吸引日本特務幹部入店，掩護我情報人員搜集敵情。日本人對他的開店做生意，存有幾分懷疑，但卻也找不到他反日的證據。於是邀他加入偽組織，許以高官厚祿，他不爲所動，虛與委蛇，答允擔任日人所介紹北平名伶的法律顧問，藉機活動，展開工作，卓著成效。

一九四四年，他奉命回重慶述職，臨行前他到北平一位朱同志寓所，商討工作計畫

甫辭出，朱氏即被捕，家被抄查，瞿韶華的身分也隨之暴露，日本特務廣印他的圖形，四出追緝，他被迫化裝逃亡，幾度驚險，始抵鄭州，乃轉赴西安入戰幹團受訓，結業後，被派赴中央組織部工作，負責黨員組訓。

抗戰勝利後，瞿韶華返北平，不久，奉調到青島，任教育部特設之臨時大學任教，次年，調回天津，任三民主義青年團天津支部幹事兼組長，由於工作著有績效，升任天津市黨部執行委員兼副處長。工作之餘，他致力探訪抗日陷區當年同生共死的同志和遺眷，呈請中央政府給予慰問和撫卹，對於曾暗中協助我秘密工作的汪偽政府官吏，他也很慷慨的向司法單位舉證，請求寬恕。他這種褒忠除奸，是非分明的行爲，博得許多受惠人的敬佩和感戴。

任副幕僚長十五年

一九四八年，瞿韶華出任天津市勘亂建國動員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那時，中共氣焰已盛，天津在其威脅下，草木皆兵，瞿韶華安定民心，維持治安，瘁盡心力，是年底，天津危殆，瞿韶華隨政府播遷來台。

初到台灣，瞿韶華出任台灣省政府專門委員兼人事室主任，輔助大陸撤退來台的教

黨務改造，幹練的瞿韶華調任中央黨部中央改造委員會總幹事，策劃推動敵後黨務，次年，再調中央委員會秘書，奉命運用其法學知識，規劃改進黨政制度，研訂組織法規，奠定台灣起飛的基礎。

黨的改造告一段落後，瞿韶華調任革命實踐研究院辦公室主任，策劃黨政幹部訓練，直到一九五八年，由於工作需要，調升行政院副秘書長，從此展開他的長期幕僚工作。

瞿韶華甫到行政院，即逢金門「八二三」砲戰，中共瘋狂砲擊金門，彈丸之地每日落彈數十萬發，情勢危急。瞿韶華配合軍方策劃運補，衝破中共砲火封鎖，補給源源運到前線，使金馬士氣大振，奮勇迎擊，卒粉碎中共攫奪金門之野心。

一九五九年八月，葛樂禮颱風襲台，釀成「八七水災」，中南部河水氾濫，淹沒農田、房舍，民間損失慘重。瞿氏協調各方，精心擘劃復建，迅速恢復舊觀。由於協調折衝的長才畢露，使他成為行政院不可缺少的人物，因而以後行政院三次改組，四易秘書長，而他這位副秘書長始終穩如泰山，任職長達十五年，所謂「甘草人物」，從此流傳。

三度代理省府主席

一九七四年，台灣省政府改組，省議會議長謝東閔出任省主席，邀瞿韶華任省政府

委員兼秘書長，他襄助主席，任勞任怨，勤勉負責，後因省主席易人，青黃不接時，瞿氏奉令三度代理省主席，但他處理公事，堅持副署代行，不肯用「代理主席」頭銜，可見他的謙沖和不慕虛名，代理省政期間，由於他待人親切，不擺架子，上下和睦，省政府推行較省主席時代更為順利而有績效，他歷經謝東閔、林洋港、李登輝三任省主席，每位新主席，都要他留任，使他欲罷不能。林洋港更說他是「天底下最好的幕僚長。」

任職省府秘書長長達七年半，直到一九八四年，政府為酬庸他的功績，改調他為考選部長，考選部是個冷衙門，除去每年一度的倫才大典高普考而外，幾乎少有新聞見報。但一向做事認真的瞿韶華，不以冷衙門而懈怠，他揭橥「公平、公正、公開」三公政策，厲行公正取才，絕不徇私。他又調整考選部組織，建立考試題庫，完成考試訓練法制化，使考選工作邁進一大步。

國史館長力創新猷

一九九〇年（民國七十九年），七十八歲的瞿韶華部長，又被層峯擢重用，調為國史館館長，成了纂修國史的掌門人，這是個學術工作，更是千秋大業，他很高興擁有所這個職位，雖已年登耄耋的瞿韶華，仍然敬謹任事，老驥伏櫪，推出多項新猷。例如他一到任，即展開對外關係，排定時間拜訪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歷史語言研究所、故宮博

中物院及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等單位，增加史識外，避免纂修國史的閉門造車。

在政府機構中，儘管國史館地位崇高重要，但仍是個少有人注意的冷衙門，他爲了提高國史館的知名度，特編印「國史館簡介」，採圖文並茂方式印刷。又攝製「國史館

影片簡介」一捲，於有人參觀訪問時播放，增進外界的認識。他又增設「史料陳列館」

，除重視錄影帶外，另以圖片及文字說明建國史蹟。分爲開國、建國、中俄西疆勘界圖、交通、鈞魚台主權、達賴十四轉世、西安事變、抗戰及憲政運動等九大項，使來館參觀者一目了然。

他還有幾項創舉：一、舉辦口述歷史，

增設口述歷史組，初期調派館內同仁兼任，分組訪談政壇要人，後來調派專人，長期訪談，所有談話先行錄音，再改成定稿，由被

訪者簽署同意，始予出版。二、舉行專題討論會，國史館的要務是纂修「中華民國史」，他於一九九二年八月首次舉行「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一屆討論會，邀請專家參加討論，並擬定「編撰中華民國史計畫綱要」，採傳統史法，分撰政紀、志書、傳記、圖表等項。

另開專題研究一門，類似「紀事本末體」，廣邀專家就各類專題分撰。三、建國百年

文獻編纂，瞿韶華有此構想，但因牽連甚廣

，直到去職，未能展開，但方向非常正確。

此外，國史館現址狹小，他曾計畫向政府爭取，遷建到台北市中山學園，種種事例，足

(傳人名外中)

中外雜誌

中

顯他目光遠大，任事忠勤。

瞿韶華於一九九五年三月，因健康不佳，辭去國史館長職務，改調爲總統府國策顧問。

次年五月初病逝，享年八十三歲。生前履行公職勤勞負責，歷任黨政職務，逾一甲子，曾獲頒三等景星勳章。

瞿夫人孫韶康女士北平中國大學法律系畢業，爽朗豁達，內外兼顧。結婚五十年，鵝鷺情深。瞿氏數次罹重疾，她守護病榻，遍尋醫方，力持鎮靜，處變不驚，輒於千鈞一髮之際奪回丈夫生命。被醫護界視爲奇蹟。

在抗戰時期，瞿夫人曾任職教育部，勝利後轉任天津市政府教育局，來臺後初任臺北工業職業學校（今臺北技術學院前身）教師。

繼尋轉任臺灣銀行信託部襄理，以迄退休。她秉性開明克勤克儉，與人爲善，常樂助人。生子女各一人。兒子瞿大中，畢業於中正理工學院造船工程學系，現從事海外工程建設。女兒瞿大文，美國南加州大學經濟學碩士，現由經濟部駐外商務人員調任投資業務處專門委員。均學有專長，服務國家社會。

（王培堯撰）

張新思維、新學術，建立新中國。自清末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獻身革命，即成革命理論家，但他並非光說不練，能夠運籌帷幄，釐訂策略，實踐革命。所以在民國肇建後，他大部分的工作在組訓青年、輔導青年，影響所及，與近代國運息息相關，而使他成

爲民國史上的關鍵人物。

丁惟汾字鼎丞，山東日照人，西元一八七四年（清同治十三年）生於日照西官莊，該地背山面海，視野遼闊，故而他自幼胸襟坦蕩，性格爽直。除自然環境影響外，家庭背景也有潛移默化之功。他的先祖丁允元就是明史上著名的姑蘇「暗錢太守」，他是丁允元的第十八代裔孫，他的父親丁竹筠是清末宿儒，曾遊幕山西太原及山東定陶縣，雖家境貧寒，但勤勉好學，精研訓詁聲韻，有不少傑作問世。其中「毛詩正韻」一書，被學術界視爲曠世傑作。清末民初樸學大師章炳麟（太炎）非常欣賞這部書，特爲之作序，序中有「經界益正，調理益密，斯所謂集其大成，金聲而玉振之者乎！允非苗夔之倫」，所得赴其步驟」等語，足見推崇之隆。

但丁惟汾對大師盛讚其父卻不以爲然，他在自己讀書雜抄「史鏡」手抄本中，附註詳述苗夔之學，又稱苗氏「能發亭林之未發」。他實事求是，不掠他人之美，即使對自己的父親也不阿諛，可見他治學的嚴謹及治

丁惟汾（一八七四—一九五四）

家學淵源長於訓詁

對國學鑽研精邃，但不主張泥古、復古，主

丁惟汾是位飽學之士，尤精聲韻學，雖

他的父親也不阿諛，可見他治學的嚴謹及治

事的真誠。

由於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父親，丁惟汾自幼讀書專心經世濟民之學，對清廷以八股文及試帖詩取士，毫無興趣，亦無心於科考。不過受父親的影響仍留心訓詁，竟成就了他對聲韻學的專精。

丁惟汾雖有名文，但家境清寒，十九歲時和國莊的秦氏結婚，夫婦於農忙時還得幫忙農事，秦夫人在他八十歲壽辰時，用山東話回憶說：「俺那個時候，還可以兩天為你家鋤一畝地哩！」

後來，丁惟汾考進直隸（河北省）保定師範學堂，開始接觸現代學術，見聞日廣，交遊迥異，從此思想變化，深感滿清政治腐敗，國勢阽危，當時盛行的維新變法也在他的觀察與思考之中，但總覺得難挽頽勢。保定師範畢業後，他以極佳的成績，考取官費

科考中式一樣，非常光榮。他的父親及地方親友無不誇讚，寄以無限的希望。

在日大戰保皇黨徒

丁惟汾到東京後，先到速成班學日語，旋入明治大學法學系，那時他年已三十，思想成熟，觀察入微，目睹日本政治開明，國勢興盛，而我國清廷對內腐敗無能，對外喪權辱國，感到前途茫茫；同時接觸到先期留學生的排滿革命思想，茅塞頓開。其時孫文

正在歐美，倡導革命，不過影響丁惟汾最深的是直隸滄州的張繼與山東徐鏡心，兩人常向他講述孫中山的思想理論，並介紹他於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在東京加入同盟會。

官費留日學生所需費用，每月向清廷駐日大使館領取。丁惟汾省吃儉用，節餘款項，濟助革命，在日本的機密活動中，達成不少任務，也經過不少風險：

(一)吸收新黨員：一九〇六年春天起，到辛亥年返國為止，他擔任山東主盟人五年，吸收武勇有才略，倜儻多奇氣的優秀黨員陳幹等三十餘人。

(二)反對日本限制留學生政治活動及其他不合理規定：一九〇五年陰曆十月初六日，

日本循滿清政府之請，宣布禁止留學生從事政治活動，激起八千餘名留學生之公憤，群起罷課遊行抗爭。日本干預的背景(一)以當時留學生甚多，分散民間、良莠不齊，屢滋事端；尤其一些日本私立學校，專以販售文憑為業，教學設備，與一切管理，均極陋劣。

(二)中國同盟會正式成立，民報發刊，聲勢浩大。清廷偵悉，極為惶恐，力迫日本政府採取行動，日本政府為敷衍清廷，特令文部省頒布此項管理條例。事後在日本的同盟會舉行會員大會，會中大致分兩派，爭辯激烈。一派是宋教仁、胡瑛、秋瑾、徐鏡心等主張全體退學回國，從事倒清革命工作。一派是居正、汪精衛、朱執信與丁惟汾等主張發起

運動，公推代表交涉，促使日本政府收回成命。因同盟會成立未久，民報發行才二期，如果一擗而散，無異自毀初基。但會員多屬血氣方剛的青年，主張回國的激烈派佔優勢，雙方爭執，不歡而散。丁惟汾主先行團結，俟對日交涉後再說。後來他們推代表交涉，漸有轉機，日本各學校態度亦多同情留學生，對政府命令陽奉陰違，終於不了了之。不料籍湖南省的陳天華烈士於十一月十二日留下血書，投海而死。激起更大的衝突。丁惟汾與居正兩人協力斡旋調解，一方面同盟會的團結不能破壞。一方面酌就各人情況採取行動，不必一致。經召集同盟會代表會議，終於互相了解，恢復團結。

一九〇四年前後，同盟會初成立時，主張君主立憲的中國留學生，在東京亦甚活躍，他們以官費生居多，聲勢亦不小，一九〇七年陰曆九月十一日，保皇黨梁啟超到東京活動，成立「政聞社」以打擊革命黨，該社會員約二百餘人，在飾輝館舉行大會，由梁啟超講演，並邀日本政治人物大養毅等人捧場。聞風而來的同盟會員人數更多於政聞社員，由張繼、居正、丁惟汾三人領導，且是有備而來。會場總人數不下千人，秩序紊亂。保皇黨誤以為他們是受梁啟超的人望號召而來，大為興奮。梁氏講演謂：「朝廷現要準備立憲，大家應該高興歡迎才是。」話剛落音，台下革命黨人突然站起，大聲叫罵，喊打，張繼揮拳直奔台上，梁啟超抱頭逃跑。

中，丁惟汾以木屐追擊，砸到梁的右額，首先發難的張繼順勢站於講台之前，大聲籲請大家安靜，接著他與宋教仁大談「中國同盟會宗旨，在革除帝制，建立中華民國。」群衆鼓掌如雷。旋即來賓大養毅：「中國究竟革命，還應君主立憲？」大養毅被迫上台，卻說：「君主立憲，對中國是否適當，中國是否能容許皇帝繼續存在，看情形很難，中國人的革命情緒已很高，恐怕還以革命為最徹底辦法。」此法受群衆鼓掌歡迎，自此梁啟超不敢再來東京，保皇黨亦告消聲匿跡。

那時袁世凱受掌權的慈禧太后寵信，權傾天下，想挾民氣以威脅皇室，達到篡奪的陰謀，乃重用楊度。楊度一黨在東京也算保皇黨的一派，他結納了部份官費生，與革命黨為敵。山東原有科名的官費生曲阜新、王不煦、安茂賓、丁世嶧等，均屬楊度黨，同盟會的周樹標、叢瑣珠、王景堯、王鴻一等，趨炎附勢，亦變節投靠，一時動搖變節，或投機跨黨分子，多博得高官厚爵。山東黨務陷入低潮。

一九〇九年，清廷派山東提學使連甲到東京，楊度率黨人在山東同鄉會館集會歡迎，策動同盟會同志潛入群衆中厲聲斥責，使連甲狼狽而遁。

創辦雜誌宣傳革命

身為山東同盟會主盟人的丁惟汾，欲將革命工作從根作起，乃於一九〇六年秋在東

京創辦「晨鐘雜誌」，以蔣衍升為總編輯，于庭樟、孫柳溪為編輯，丁惟汾為發行人，他不斷的撰寫文稿，刊載於雜誌上，揭發朝廷腐敗政情，表揚明末遺臣反清活動，宣傳民主革命思潮，闡釋孫文三民主義，報導革命黨人奮鬥犧牲事蹟，並對山東先賢孔撝約，郝蘭皋、桂未谷、周永年諸人的學問道德，大加表揚，指出他們實事求是的治學方法，合於現代科學家的歸納法，鼓勵大家讀書求學經世濟民。晨鐘雜誌每期除在東京流傳外，並秘密運至青島、煙台等地，分發各級學堂，供師生閱讀，頗受歡迎，對啟發思想，宣揚主義，鼓吹革命，很有成效。後來他又在山東境內，策動同志創辦山東白話旬刊（社長劉冠三）、煙台渤海日報（社長謝鴻熹），邀魯籍同志徐鏡心到長春辦盛京時報。此外並推動興學組織創辦山左公學於濟南、東牟公學於煙台、震旦公學於青島、寶萊公學於即墨，以樹立革命事業的始基。

一九一一年，丁氏秘密回青島，約集同志策劃舉義，適武昌革命軍於陰曆八月十九日首義，連定武漢三鎮，南北各省陸續響應，丁氏運動山東巡撫孫寶琦宣布獨立果，袁世凱恐懼不已。民國五年三月丁氏到滬，途發動討袁軍事，各縣紛起響應。此仆彼起，雖經斬雲鵬軍個別擊破，但聲勢壯烈，使袁世凱恐懼不已。民國五年六月袁世凱聯絡十七省國會議員聯名通電討袁，同時通電公告各國駐華使節，請其具報各國政府，使其知道中華民國全體國民，為伸張國法，誅除叛逆，不達目的不止。同年六月袁世凱暴卒，洪憲帝制瓦解，丁氏奔走南北與各同政府。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丁惟汾任山東法政專門學校教師，後任校長。同盟會於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丁氏又隨孫文到滬，參與組織建設社，發行「建設雜誌

志策劃舉義，適武昌革命軍於陰曆八月十九日首義，連定武漢三鎮，南北各省陸續響應，丁氏運動山東巡撫孫寶琦宣布獨立果，乃偕胡瑛到煙台，驅逐鎮標官王傳炯，佔領煙台，而以胡瑛為山東都督，隸屬武漢革命政府。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丁惟汾任山東法政專門學校教師，後任校長。同盟會於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丁氏又隨孫文到滬，參與組織建設社，發行「建設雜誌

志策劃護法運動，聲討北洋軍閥，嗣隨孫文赴廣州，參加在粵召開的非常國會，組織華民國軍政府，以孫文為海陸軍大元帥，主

東省黨部理事，負責全省黨務。民國二年，當選為國會會議員，當時國會內黨派複雜，但國民黨在參眾兩院均為第一大黨。共和黨（領袖黎元洪），傾向袁世凱，為第二大黨。民主黨（君主立憲派湯化龍、林長民等組成，梁啟超為領袖）為第三大黨，亦與袁世凱妥協。

參與驅段維護約法

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丁惟汾出任山東法政專門學校教師，後任校長。同盟會於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丁氏又隨孫文

」。其時孫文倡導革命，不僅著眼於政治改革，也注重思想革新。建設雜誌的宗旨在「以鼓吹建設之思潮，展明建設之原理，冀使吾黨建設之主義，成為國民之常識。使人均知建設之需要，均知建設為易行之事務，由是萬眾一心以赴，而建設一個舉世最富強最康樂之國家，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為了配合建設雜誌宣傳，丁惟汾又在滬創辦「北方週刊」，配套發行。是年四月至七月，他回到山東，策動濟南學生反對巴黎和議運動。連續遊行示威，是為「五四運動」之嚆矢。

丁惟汾於民國九年隨孫文回廣州，旋又奉命赴雲南，聯絡各界，策動地方武力，響應護法號召，是年，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他受命為山東支部長，秘密督導山東省境黨務，策動同志創辦報刊，加強發展基層組織。

輔導青年南北奔波

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六月，陳炯明攻擊孫文，孫文於八月十三日由廣州脫險至上海，丁氏正在上海，奉命設法開展北方黨務，經與張繼、劉榮棠、鄧天乙等組織北方執行部（後改為北方總支部），丁惟汾、張繼出任北方黨務特派員，進行北方執行部的任務。這一工作為全國黨務五大地區之一的方面大員。他奉命後，帶王樂平、延國符等到北京，先於銀闈六號設秘密機關，在北

洋軍閥的橫暴殘狠的形勢下，發展整個北方的黨務，吸收青年，擴展組織，宣揚主義，普遍深入各省縣市基層，布建革命工作，並知建設之需要，均知建設為易行之事務，由軍閥勢力，對於後來革命軍北伐，發揮了積極潛在的支援作用。丁氏是剛毅木訥的書生，他的領導作風，重在力行，埋頭苦幹。在北京冒險犯難的秘密工作中，尤須咬緊牙關，忍受橫逆，承擔繁劇。傅斯年在丁氏七十壽序中的「鷹揚河朔，風雲玄感」兩句，就是形容其當年指導北方黨務的話。

丁惟汾負責北方總支部期間，重要的表現有：

(一)策動北京革命瓦解直系軍閥：奉軍張作霖於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分兵六路向山海關及熱河展開所謂「直奉二次戰爭」，在北京的直系賄選總統曹錕下令討伐，以吳佩孚為討逆總司令，彭壽華、王懷慶、馮玉祥分任第一、二、三路軍司令。吳佩孚親自督師山海關。丁氏協同陝西籍的劉守中秘密策動馮玉祥、胡景翼兩軍於十月二十三日戰事激烈之際，從古北口前線潛行班師回京，聯合京畿警備副司令孫岳發動「首都政變」，通電停戰主和，包圍總統府，囚禁曹錦，以黃郛（膺白）為國務總理攝行大總統職務，撤免吳佩孚本兼各職。馮玉祥等部於政變後，改稱國民軍，馮為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景翼、孫岳為副司令，分兼第二及第三軍軍長。下令改訂清室優待

條件，驅逐廢帝溥儀出宮，改設故宮博物院，完成辛亥革命未竟的任務。後來段祺瑞被推為北京臨時執政府執政。電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自廣州入京，共商國是。直系軍閥自建國之基礎外，並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孫總理於歲杪入京後，因患肝癌惡化，醫治罔效，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喪事的一切，均由北方總支部負責主辦。

(二)反共鬥爭：丁惟汾負責的北方總支部黨務工作，極為艱苦，經常秘密南北奔馳，而在北京軍閥淫威之下，三面作戰，一面發展國民黨組織，一面對付軍閥；更苦的是還與共產黨鬥爭。當時係「聯俄容共」期間，共產黨表面上是以個人參加國民黨，實際上處處發展共產組織，與國民黨爭領導，時時製造矛盾，破壞國民黨團結。共產黨首要分子李大釗（字守常，時任北京大學教授，為中共創始人之一，任中共中央北方區常委）在本黨聯俄容共的藉口下，加入北方總支部工作，但他在京、津各大專院校及文化團體宣傳馬列主義、唯物史觀與階級鬥爭，吸收青年學子，把持各種工會，由蘇俄大使館掩護，積極活動。丁氏為抵制李某的猖狂活動，請准中央邀請在北京、清華兩大學任教之顧孟餘、朱家驛參加北方總支部，共同領導青年，推動反軍閥、反帝國主義運動。他兩人都發揮了很大的領導作用。同時網羅一群

忠貞的男女青年黨員秘密歃血爲盟，組成「孫文主義大同盟」（簡稱 S.L.），推派同志分別深入青年農工群衆中活動，層面遍及洋車夫、汽車司機、電力工、鐵路工、電車工、印刷工、挑水工等，與共黨展開工作競賽，成果斐然。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北京特別市黨部改組，爲遏阻共黨分子在黨內擴展，致黨權旁落，鼓勵劉巨全女士等參加競選，結果劉女士當選爲執委兼常委並兼任農農部部長。

(二) 驅段運動與三一八慘案：段祺瑞執政

後，起用安福系分子，堅持軍閥政治與親日媚日作風，國民黨同志均認爲長久下去，違失首都革命原旨，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春，馮玉祥，張作霖交惡，爲防範奉軍進侵，國民軍控制大沽口海港交通，保衛天津。三月九日，日本以違反辛丑和約爲由，向北洋政府提出最後通牒，段祺瑞竟屈服接受，下令撤離大沽口防軍，引起人民激憤，國民黨北方總支部趁機策動倒段，並爲國民軍聲援。於三月十八日上午十時，糾集各校師生、總工會、鐵路工會等工人及市民等萬餘人，各持標語旗幟，列隊於天安門廣場開會，要求段祺瑞辭職，捕辦章士釗、曾毓雋、李思浩、姚震、朱深、劉百昭等，大會由丁惟汾、顧孟餘、徐謙等主持，推朱家驛爲總指揮兼主席，朱氏講話後，即高呼「打倒段祺瑞」口號。大會結束後，整隊遊行，先

抵鐵獅子胡同執政府請願，府門左右，架設機關槍，武裝警衛荷槍實彈，如臨大敵。群衆即時公推丁惟汾、陳公博、王樂平、安体誠、譚季緘五人爲代表，欲攜請願書入內，而槍聲大作，要驅散群衆，群衆以木棒、竹竿與警衛互擊，群衆死亡四十六人，輕重傷一百五十五人，警衛亦有受傷者。次日，朱家驛召集民衆大會於神武門（在天安門內），決議七項要求：

- (1) 即日解除段祺瑞職權，聽由國民裁判。
- (2) 在國民會議未成立前，組織國民臨時委員會，以召集國民會議。
- (3) 責成國民軍服從民衆大會一切決議案。
- (4) 徵辦賣國賊，查封其所有財產，並追究賣國贓物。
- (5) 通緝賣國賊，由國民公判。
- (6) 解散關稅會議，宣布關稅自主。
- (7) 查辦金佛郎案。議決上列各案後，馬敘倫、顧孟餘向大衆講演。然後列隊往吉兆胡同段祺瑞住宅，並轉往章士釗、李思浩、劉百昭、朱深、曾毓雋、姚震等家，均聞風先逃。

四月九日，北京警備總司令鹿鍾麟，因應民意，驅逐段祺瑞。十五日，國民軍退出北京，扼守南口，張作霖率奉軍入京，自稱海陸軍大元帥，與吳佩孚修好，聯合進攻國民軍，並抵抗南方國民革命軍的北伐。

一九三七年（民國十六年秋），國民革命軍定鼎南京，北伐之師，分道競進，氣吞河朔，威懾江淮，流竄江北之北洋軍閥孫傳芳、蔣寧、漢分峙，蔣總司令辭職歸里，首

都群龍無首之際；突率殘衆，乘虛偷渡奇襲，一舉佔領龍潭，直逼棲霞，革命軍派軍迎擊失利，敗退至麒麟門。孫軍準備由此攻幕府（在江寧縣西北），窺天保，眼看南京旦夕可下。

斯時，丁惟汾任國民政府委員，與胡漢民、戴傳賢、居正、譚延闔、張繼等，坐鎮南京，指麾若定，使在前方負責軍事作戰之何應欽、白崇禧能以必死決心、必勝信念。親率特務營，沿途收集官兵，編組成軍，馳赴龍潭漂作戰，血戰七晝夜，卒將孫軍七萬餘之衆擊潰，孫傳芳僅以身免。解除南京禦卵之危。

丁惟汾自同盟會開始，革命、倒袁、護法，以至國民革命軍北伐，南北奔波，一直與青年密切接觸，保持青年朝氣，在廣州時，曾任中央青年部部長，主持北方總支部時，積極吸收青年學子，致力革命運動。

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遷設南京後，掃蕩軍閥，統一全國，黨政各方，亟需大量忠貞革命政治幹部。是年五月五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與中央各部會首長舉行第八十八次聯席會議時，宣傳部提案：「設立宣傳訓練班」，討論時意見紛紛，獨丁惟汾認爲宣傳訓練班不足以應付當時急需，力主設立中央黨務學校，培養黨政基層幹部，健全黨務組織，革新地方政治，永保精誠團結，承擔清

共抗共任務。此議一出，全場氣氛，一致通過。推定蔣中正、胡漢民、戴傳賢、丁惟汾、陳果夫、吳倚滄、曾養甫、劉蘆隱、羅家倫九人為籌備委員。」

五月二十日，中央常務委員會議第九十二次會議，決議：任蔣中正為中央黨務學校校長。丁惟汾、戴傳賢、陳果夫三人實際負責籌備工作，並出任校務委員，丁氏後來又先後擔任教育長、訓導長（其正式職務為中央訓練部部長）。直至民國三十六年，他和中央黨校的關係始終未斷。

民國三十六年，中央黨校改製為中央政治學校，蔣校長辭職，丁氏亦離職，在黨校二十年，丁氏為黨國培植中高級政治人才近萬人，對國家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思想之現代化，起了啟發與導引的重大作用。

丁惟汾奔走革命，席不暇暖，食不甘味，但他治學卻未偏廢，自幼繼承其父丁竹筠衣鉢，研究訓詁聲韻，直至一九五二年（民國四十一年）罹患重病為止，公餘研讀寫作始終不輟，力避應酬，埋頭治學，完成皇皇鉅著。在他八十歲時，總計完成「毛詩韻律」（不分卷）、「算叢錄」、「詩毛氏傳解故」（三十卷）、「爾雅釋名」（七卷）、「爾雅古音表」（十九卷）、「方言譯」（十三卷）、「詁雅古音表六種」刊行問世。此外，尚未有未完稿，未出版的筆記六種，如：「詁雅堂讀左傳筆記」、「詁雅堂讀國語筆記」、

「詁雅堂讀孟筆記」、「詁雅堂讀荀筆記」、「詁雅堂讀莊筆記」，與「釋名譯證」。另有「讀烈皇小識摘錄」、「讀聖安本紀摘錄」（顧炎武著）、「讀青鱗屑摘錄」（南明野史之一）等，集於一手抄本，題曰「史鏡」。

他從明史貳臣傳中，統計了山東籍的貳臣二十一人，註明其邑里，顯示他對貳臣之痛恨，充分表現其革命思想與源泉。為表揚山東革命黨人的感人事蹟，保存山東革命史實，他又主編「山東革命黨史稿」一部，十三卷，附黨史後編六卷，附錄一卷，附「山東先烈傳」二卷，與先烈「碑傳錄存」一卷。

傅斯年所作「日照丁鼎丞先生七十壽序」中云：「夫河汾佐命之談，實出於偽託，濟南傳經之儒，未達於有政，其能退而傳經，進而名世，如我日照丁先生者，曠覽史乘，未多覩也。丁先生累業治詩，規矩於浮丘之宗；生值胡運，憤疾乎索虜之治。……斯真內蘊其光，外揚其烈，以師儒而濟世務者也。……」誠非過譽。

本雜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 未經徵得同意，一律禁止轉載，如有侵犯依法追究。

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日有十數起，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本誌以名人傳記、真實傳奇、軼聞趣談、工商珍聞、現代史話、懷舊憶往、醫學新話等作品為主。希望作者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來稿以五千字為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來稿若未採用，恕不奉還，亦不退稿（請自留影印底稿照片亦請翻照複印存底）。

丁惟汾平生謙和敦厚，自奉儉約，不因環境而有所改變，儘管位至中央常委、秘書長、國府委員、監察院副院長、監察委員等，而布襪、布履與一襲敝袍，習以為常，所住兩三間小屋，藤床竹几，保持著山林逸士的生活型態，來台後，出無專車，時任監察院監察委員，赴監察院開會。常坐三輪車，或搭乘公共汽車，但從不議論別人奢侈，或空談節約救國等高調，蓋因他的淡泊寧靜，出自天性，而非矯情炫世者可比。丁氏於一九五四年（民國四十三年）五月十二日病逝台北，享年八十一歲。（黃金文撰）

丁惟汾平生謙和敦厚，自奉儉約，不因環境而有所改變，儘管位至中央常委、秘書長、國府委員、監察院副院長、監察委員等，而布襪、布履與一襲敝袍，習以為常，所住兩三間小屋，藤床竹几，保持著山林逸士的生活型態，來台後，出無專車，時任監察院監察委員，赴監察院開會。常坐三輪車，或搭乘公共汽車，但從不議論別人奢侈，或空談節約救國等高調，蓋因他的淡泊寧靜，出自天性，而非矯情炫世者可比。丁氏於一九五四年（民國四十三年）五月十二日病逝台北，享年八十一歲。（黃金文撰）